

浮云远志

谢喆平
访问整理

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學藝文

學藝文

浮云远志

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

谢喆平 访问整理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云远志: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谢喆平访问
整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10921-5

I. ①浮… II. ①谢… III. ①清华大学—名人—生
平—事迹 IV.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788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浮云远志

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

谢喆平 访问整理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921-5

2014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插页 12

定价: 68.00 元

序 一

早就知道谢喆平博士在做清华学人的口述史研究，而且几乎每次和她见面，都会听到她兴致勃勃地谈论自己的研究。每有新的线索和发现，她都特别兴奋，那种热忱和投入很让人感动。因此当谢喆平博士送我《浮云远志》的书稿，并请我写序时，我欣然同意。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连绵不断的历史长河正是由一个个具体人物、事件、活动等构成的浪花和水滴所构成。虽然研究历史不能只关注浪花和水滴，而要抓住将它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人类社会变迁的整体走势和结构，但以口述史为代表，对相距未远、尚未被符号化的人物与事件进行个性追寻和描述，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英国史学家汤普逊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所说：一旦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原材料来利用，那么历史就会被赋予崭新的维度。

历史是由人来书写和讲述的。“历史”对于后世的研究者来说，常常并不是历史活动本身，而是记载和表现历史活动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认知与解释。研究历史有多种作法，即使不从史学理论的角度，人们也能从经验中感知：历史在不同人的笔下和眼中是不同的。整理者用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不到30年的历史，浓缩了清华大学这所百年名校及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与变迁，而且其笔下，政治学系的机构存在只是背景、是舞台，运用学科教育史对这一机构的考察只是拉开序幕，真正的主角是在这一背景下和舞台上活动的人——清华政治系学人。本书浓墨重彩地讲述政治系学人的生活、

工作，或由他们自己，或通过他们的后代，勾勒出这些主角在特定背景的大舞台上充满个性魅力的历史细节。在本书中，我们能感受到不同人物、不同角色和视角发出的声音。如吴采采回忆父母吴之椿与欧阳采薇的一篇，既有女儿吴采采的忆述，也有其母欧阳采薇自己的回忆，还有朋辈、亲友及学生的记述，当然还有整理者完成写作后的手记。这些声音构成了音色丰富、旋律的历史交响乐。

历史既是对往事岁月的记忆，也是对逝去时光的反思与校正。在历史研究中，史料的爬梳、整理和加工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挖掘和理解隐藏在这些符号背后的人的活动及思想。在表现和揭示人的活动及思想的独特个性方面，口述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本书中，张文朴回忆父亲张奚若时谈到：父亲早年给胡适的信中讲赴美留学的学校是“科大”，其实是哥大（当时没有统一的译名），后来有研究者在撰写张奚若传记时误认为是德国的科隆大学，后又被演绎为“张奚若留美期间去了欧洲，在科隆大学进修，后又返回美国”。这种以讹传讹的错误出现在“最恨沽名钓誉”的张奚若身上，难怪张文朴要用“让我哭笑不得”来形容了。

通过口述史所得，以个人感知和记忆所支撑的有可能是碎片化的历史，一旦将其放入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纳入五光时色的社会背景中，就能显现出历史的丰富与多面。口述史通过勾画个人生活经历，家族人物历史等，呈现出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整体变迁。口述史丰富了人类记忆，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将人从符号的避难所中解救出来，带回现实世界。口述史打破了冷冰冰的制度与鲜活世界的隔阂，突破了由时空、代际、境遇等不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交往和理解的障碍。

在本书中，无论是修了一辈子“学术铁路”的汤象龙，还是五代清华的唐氏家族；无论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40年后当选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的王铁崖，还是才华、抱负同样优秀，但个人命运更为坎坷的楼邦彦；他

们的人生经历都与所处时代紧密相联，他们的个人故事折射出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

本书使我们不仅看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真实经历，也感受到由历史回放带来的心灵震撼。

史静寰*

2014年1月5日

*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序 二

谢喆平博士访问整理完成的这部书稿，例属口述史之文本。按照一般理解，口述史源自对相关人物的深度访谈，录以访谈对象的口语叙述；相较于文字史，口述史似乎长于感性表达而短于证据呈现，强在细节描述而弱在叙事零散。然而，历史之真相，往往显露于细节之中；往事之鲜活，亦通常体现在亲历亲闻者的个殊化和情感化的用词之中。追究下来，早期的历史记载无非源起于忠实记录以口相传的故事，古时的成文文献也多是言说者和聆听者共同劳作的结果。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分说：“文，典籍也；献，贤也。”此处之贤，即是宿贤之谓；因而所谓“文献”，即是圣人言、贤者言、故老言之文字记录的统称。由此观之，口述史的根苗和意义当得确认。

然而，在档案资料无法获取、成文史书没有记载、相关研究尚付阙如的条件下，对于特定的已故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追寻和描述，甚至是仅仅关涉相距未远的时段，却不能不依靠口述史的方式展开“抢救性挖掘”。因此，口述史不是无奈的选择，更是有意的决断。这正是近年来学术界、出版界和读书界热衷于口述史的根本原因。口述史的功能与作用于此彰显无遗。而这部书稿，无疑是对口述史之价值的肯定。

说起来，凝聚了数年心血、耗费了巨大精力的这部书稿，竟缘起于不经意间的一次“发愿”。2009年年末，清华政治学系启动重组之时，对于档案资料的初步搜索和数据资源的深度挖掘，却未能发现有关清华政治学系历史

的完整叙述。但片断闪现的讯息却明确提示着，诸多知名学者和风云人物与清华政治学系有若隐若现的关联；清华政治学系与诸多历史事件和内幕故事亦有丝缕可辨的瓜葛。最初的搜寻始于罗列清华政治学系创建的主事者，以及此后存世 26 年期间的系主任名讳事迹。当清华第一位政治学课程华人教员唐悦良得到确认后，本书整理者在一次国际会议的茶歇时偶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唐虔博士，寒暄客套之余，听说作者正在清华工作，唐博士说起自己的祖父和父母也曾在清华任教，在提到祖父的名字时，突然触动了作者此前听到过的那个人物。于是，对话持续展开，便有了《一门唐氏，五代清华》的文章。在《看历史》杂志为清华百年校庆发行的专刊中，此文以口述史写作的方法和独家披露的照片，追溯辉煌一时的清华文科系所，追忆根植深远的清华教育世家，令人印象深刻。生性喜好追根追根的喆平，自此“发愿”，要看一看到底能够从历史的线索中找到多少往事的亲闻亲历者。

随着工作的展开和时间的推移，最初兴之所至的“发愿”却成了巨大的工程，追寻故事本身也成就了无数故事。张奚若先生的公子、钱端升的公子、端木正的女儿，从老一代清华政治学系教授的后裔，又扩展到已是耄耋老人的清华政治学系毕业生，例如年近九旬的张遵修、张辅枢和许光建。喆平的节假日周末，登门拜访成为固定选项；京城内外，留下了匆匆足迹。倘非囿于经费有限，1920 年代的美籍政治学教员魁格雷 88 岁的女儿也定会纳入访谈行列。她因父任教清华而出生于北平协和医院，不仅保留了清华早期的诸多文物，而且还有父亲的在华旅行日记、母亲的北平家居账簿和自己的出生证。同样的情形还可见之于名列清华英烈碑第一位的政治学教授杨光泂的女儿，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以及美国华人“百人会”首任会长的杨雪兰女士。倘若能进行深度访谈，无疑可以为本书增添华彩段落。当然，这也是本书深以为憾之处。

但在略知内情者看来，大可不必过分自责和内疚。写作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口述史必定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相反，持续三年的搜寻、探访和访

谈，以及现已成文的书稿，已经充分证明了整理的苦心所向和苦功所在。分享受访对象的悲欢、同感历史命运的跌宕，自然会使作者难以持定口述记录者的旁观角色，尽管其记录仍尽量执守客观中立的立场。“存亡三十载，事过悉成空。不惜沾衣泪，并话一宵中。”唐代大诗人韦应物的诗句似已经妥切刻画了口述访谈时的场景。

坊间所见之口述史，多是历史人物以其自身经历为主轴而展开述说。而这部书稿却显有不同，特意围绕着清华政治学系而进行访谈。作为一个学术机构，清华政治学系的血脉始于1911年后庚款留学生中以政治学为终身志业者，雏形于1922年清华师生共同组成的政治学会，建制于1926年清华改制为大学之时，壮大于1928年改制为国立大学之后；抗日军兴，经战火而弦歌未缀，历艰辛而薪火未熄，反而成就了1938年之后西南联大的神话。复员回到北平，转瞬即到解放，清华政治学系虽于1952年因院校调整而遭取消，但存世的26年间，清华政治学系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众多英才，其功不可湮，其事尤可叹。这部口述史终于为这个学术机构以及与之发生过联系的历史人物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字影像。久蒙于积年累月的尘埃之下的历史真相亦显现了辉煌耀眼的光芒。

古人诗云：“佳名德雨闻前代，尺字商霖证昔年。”（宋，虞俦）乐于阅读且勤于思考的读者当能体会到这部书稿所传达的理念。

思虑及此，特撰此文以为序。

张小劲*

于清华园明斋

*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主任。

目 录

前 言	1
1 不曾远去的身影	12
唐虔口述：我的祖父唐悦良	12
2 清华缘	28
吴采采口述：我的父母吴之椿与欧阳采薇	28
3 志士与学者于一身	42
张文朴口述：我的父亲张奚若	42
4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74
钱仲兴口述：我的父亲钱端升	74
5 学术生命化	91
汤经武口述：我的父亲汤象龙	91
6 吹尽狂沙始到金	110
曾尔恕口述：我的父亲曾炳钧	110
7 造化当初果有因	122
姜逸波口述：我的父亲姜书阁	122
8 落叶满空山	135
徐大元口述：我的父亲徐义生	135

9	匆匆，太匆匆	149
	楼秉哲口述：回忆父亲楼邦彦	149
10	春蚕到死丝方尽	171
	王依、王莉、王亭口述：我们的父亲王铁崖	171
11	法律是可能公正的	192
	陈达隆：我的父亲陈体强	192
12	朝闻道，夕死可矣	205
	刘苏里、徐征：忆师杜汝楫	205
13	命中注定学法律	213
	端木美口述：我的父亲端木正	213
14	从西南联大到清华	229
	齐锡玉口述	229
15	我读清华政治系	237
	张遵修口述	237
16	一个进步学生的回忆	243
	李詠口述	243
17	一个东北青年的求学岁月	249
	于坚口述	249
18	大动荡中的求学与思考	260
	王宏钧口述	260
19	师高弟子强：从清华中学到清华大学	271
	张辅枢口述	271
20	短暂的清华岁月	279
	许光建口述	279

跋	287
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287

附 录

清华政治学系 1926—1952	谢喆平 303
一、乱世建系	304
二、北伐前后	306
三、十年发展	308
四、抗战—西南联大	312
五、选择与结局	314
老清华政治学系的建立与崛起	谢喆平 316
一、学科建制	316
二、老清华政治学系的教员群体	319
三、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的演变	322
四、学术评估	329
五、议政与参政	332
六、结语	333
后 记	335

前言

一

这部口述稿的访谈与整理，前前后后一共花了三年多时间，大大超出最初的估计。这期间，好奇心像雷达一样，随时在阅读与交谈中捕捉可能的线索，就像在浩瀚的宇宙中寻找未知世界，有时候找到一点微弱的电流，但那电流可能会突然断掉，再也找不到，但是也时常会有别的新线索。后来逐渐明白，在时光的河流里打捞一段逝去的岁月，能捞起什么人、什么事，完全可遇而不可求——也许上天会留下一些线索，但也带走了另一些，让你永远找不到。整理完成定稿时，才意识到其实做这代人的口述史多少有点幸运，一来因为那一代的学人人数不多，聚焦相对容易，而且他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很高；二来“二十世纪对于我们，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则相去未远”¹，其人其事与现在所距不算太远，可供交叉比对的资料毕竟丰富。

以“系”这样的学术建制为单位整理口述史文稿，在研究上当然有意思，即以历时性的“集体记忆”方式来保存和观察特定人群对过往的记忆，梳理现代高等教育落地与生根的过程。当然，这是逐渐形成的看法。最初的整理初衷有两点，一是把在梳理过程中宽泛的阅读所得记下来；二是想把一个学术单位成员的经历记录下来进行观察和比较。相较起来，第一点是给自己一个交代，第二点是想看看赫赫有名的中国近代精英教育究竟怎样展开，如何行进，到底如何。一般来说，单位建制的研究端正庄严，当然有政治史和学

1 方俊：《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序言。

术史上的研究意义，但是再宏大也是个体生命的总和，虽说个体之和未必等于整体，但个体的细述一定有助于理解整体，这也是以个体为“原点”进行口述整理的部分原因。

由于各种条件所限，本书采集到的师生全部是 1949 年以后留在中国大陆的。萧公权、浦薛凤等人去美赴台，没有采到关于他们的内容，当然非常遗憾。本书中的很多口述对象从事学术工作，这并非是刻意的选择，而是因为学术工作本身的“高能见度”，即一来其人其作品在资料检索时易于获得；二来其文其书其事有其弟子代代传承与讲述。遗憾的是，毕业离校后从事其他行业的师生往往难觅踪迹，更无从采集口述——这当然影响以“系”为单位的口述史的完整性。但是，完美的计划和完整的内容，也许本就是奢望——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和能做成什么，终究是三个范畴的事。

二

老清华的政治学系一共只存续了 26 年，前后任教的先生一共 40 多人，培养的学生一共 110 多名，在国内国际、海峡两岸，鼎鼎大名者大有人在，可谓国之栋梁。以当今时髦的大学“成才率”来说，当然非常惊人。又因为老清华几乎没有过法律系建制，所以法学，尤其是国际法课程也涵盖于政治学系之中——该系的主干课程包括中外政治思想、比较政府、政治史、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当时的政治学分为政府、政事、国际关系三类，其中宪法史与法学属于政府类，国际法属于国际关系类¹），因此，除了政治学人，老清华的法学人才也大多出自该系。

以该系师生的学术成就论，最经典的是何炳棣给出的辉煌评价：整个 20 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版即被誉为国际名著的只有两部：萧公权的康奈

1 “政治学”，见《钱端升学术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第 451 页。

尔大学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和陈体强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有关承认的国际法》，这两位都出自清华政治学系，一治政治学，一治国际法。在多数人文社科领域的留学生至今仍以中国问题为论文选题时，他们早早避简就难，直面主流学术问题，且博士论文一经出版即成为世界名著，可谓“空谷足音”。

实际上，1899至1948年全国一共只有20万大学生（1946级齐锡玉有一次为领导人做翻译时听国家教委负责人所说），资料中说当时念高中的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大学毕业生更只有0.01%，真真是凤毛麟角。加之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强调学校“实用性”课程，即科学、技术、农业和医学，在这样的教育条件下，这样的政法师生当然更是少之又少的精华人物——何止精华，简直就是奢侈品。所谓奢侈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这100多名师生，当然不是什么非生活必需品，但是，他们是国家的必需品。今天文盲率已经降到5%以下了，大学毕业生年以百万计，这样的奢侈品成为常备品，所体现的是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完成。当然，这种“奢侈品”的难以复制，不仅源自独特与稀缺，也与时代的不可复制有关。清末民初的废科举、兴大学，是自唐以来的高等教育大举措；清廷亡、共和兴，更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的大变化；反帝、抗日、国共内战，中国的国内政治第一次和世界形势高度相关，不情不愿地从数千年的朝贡体系走入现代国际体系。老清华这一批人的成长，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既有中学传统，又修习源自西方的现代政法社会科学，所以会将士大夫的家国责任与现代共和制意识融合在一起，形成特别的使命感与学术关怀。

譬如因欧美革命大多由财政问题引发，汤象龙、曾炳钧先后转攻财政史与比较财政制度（甘介侯的哈佛政治学博士论文题目是“政治视角下的法国预算”，同届的哈佛经济学博士陈岱孙抗战之前完成的书稿也是关于比较财政制度¹），开辟社会经济史研究；为建设现代强国，钱端升不但自己投身宪法与行政法，更曾计划将高足楼邦彦培养成王世杰一样的宪法大家；因为不

1 甘介侯、陈岱孙、萧公权是清华1920级毕业生，同船赴美，同在1926年拿到博士学位。

平等条约的屈辱，王化成、王铁崖、陈体强与端木正三代师生投入国际公法。尽管今时他们的生命已不在这个世界，但是所留下的文字与思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学——即使“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¹，即使他们的知识内容于今而言大多只有知识史上的意义，但是看他们当初论文题目的着力点，比如楼邦彦对制度问题的强调，钱端升对政治学是否是科学的讨论，张奚若对主权与人权的辨析，题目之“时尚”，足令人忘却今夕何夕。尤为难得的是，萧公权的《多元政治论》所批评的拉斯基，正是张奚若等人所推崇的，这些观点不同、取向相异的学人同处一系，赋予了学生们丰富的思想与知识资源。

这一批学者承继的，除了传统的中国学问，主要是英美政治哲学（尤其是拉斯基的思想和卢梭的思想）、政治制度和国际法的学统，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哲学与法学传统（国际法或许是个例外）渊源倒并不算深厚。从学科发展和时代而言，他们当然有局限与短板。但是，相较清季以前中国学者清一色的纯国学背景，作为第一代现代社会科学学者，这一代人的现代学科训练与国际化的知识背景，对之后乃至今天中国政法知识谱系的生长有很大关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近年来一版再版，便是明证。而他们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一代进入行政、司法、学术等公共领域服务，是他们最珍视的贡献罢。

这批师生的思想取向和人生选择也非常值得探究。除了一心向学的师生之外，很多师生选择了进入实务工作，在国共两党都有不俗表现，在国民党一边，有浦薛凤（国民政府行政院副秘书长、台湾省府秘书长）、刘师舜（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王化成（国民政府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姜书阁（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陈之迈（台湾驻加拿大、菲律宾和日本“大使”）、俞国华（台湾“行政院”院长）等人，这固然有抗战报国学人从政的时代因素，但胡适送给蒋廷黻的那句“出山还比在山清”，也是他们当时的志向所在。

以本书采集的20位师生而言，1930级的唐明照在清华、1946级的齐锡玉、

1 陈寅恪所撰《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